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2 期（总第 336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8 年 2 月 5 日

-
- ◆ 精神的丰碑·····刘济民(1)
 - ◆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新文化创新·····刘年艳(3)
 - ◆ 浅谈国人大健康事业的研究方向·····任荣荣(12)
 - ◆ 元代的戏剧一条街·····张宝贵(15)
 - ◆ 中国工业化的先声·····张蓝水(18)
 - ◆ 振兴乡村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贺雪峰(21)
 - ◆ 中国的“精准扶贫”及其未来·····郑永年(22)
 - ◆ 二十四节气的演变·····梁庆鹏(25)
 - ◆ 农发推进种业科技创新·····福建省农业厅(27)
 - ◆ 在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座谈会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上的讲话·····胡兆荣(28)

精神的丰碑

——《信仰》序

刘济民

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先生最近出版一部大书，书名《信仰》。这是为纪念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逝世五周年、诞辰九十周年特约出版的一部专著。

改革开放以来，写吴仁宝同志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新闻报道，等等，铺天盖地，如潮如涌，难计其数。写老书记，如何选择新颖的主题，不是太容易的。我们欣喜地看到纪硕鸣先生以独到的视角，别具一格的选材，真诚质朴的笔法，集中地触及到了仁宝同志思想、境界、精神层面那些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往事。读纪先生这部书，确有一种翻山越岭、登高望远、攀登人生新境界的感觉。

建村五十六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仁宝同志领导下的华西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千万人到华西来考察、学习、参观、培训、旅游度假、体验生活。近几年，华西村每年接待中外宾客达200万人次。

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人们到华西来，在这个总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1500多人、曾经特别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人们在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在中国共产党的最基层，见证了创建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震动全国的辉煌巨变、震惊世界的天下奇迹！

人们在华西村看到的不只是日益增长的丰厚的物质财富，不只是优美圣洁的环境、文明和谐的社会和村民们富裕幸福的生活，人们尤其体验到一种伟大的精神，那就是吴仁宝精神。

什么是吴仁宝精神？我们从纪先生的这部书里看到，吴仁宝精神就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精神，就是超时奋进的精神，就是忘我奉献的精神，就是坚定信仰、坚守信念的精神。

仁宝同志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楷模。我同仁宝同志交往三十年。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听他讲过“敢于担当”这个词。其实他是做得比说得更好，他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伟大实践者。为了使华西村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使华西村民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过上有着足够体面和尊严的好日子，他把全体村民的艰难愁苦和美好愿望都扛到自己的肩上，自觉地担起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和神圣使命；自觉地做到不是当官享受，而是当家受累，他是全村的当家人。他把全村的许许多多的难题都破解了，很精彩，很神奇，很有创意；村民为之欢呼，国人为之感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视之为经典。这就叫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仁宝同志不只是与时俱进，他更是超时奋进，他是真正的奔跑在时间前面的人。他说：“我别的事不想，我专门想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他说：“我最爱好的就是工作。”为了兑现他的这些庄严承诺，他几十年来都是拼命工作，超时工作。他是把一天当两天用，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他还说：“我平时不去想自己活多少年，而是想我有生之年怎么去多做工作，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追求他所说的那种“最大的幸福”，他耗尽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和才智，硬是累病了，累倒了，累死了！这就叫超时奋进！

仁宝同志不只是无私奉献，他更是忘我奉献。他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亲民如子、惠民如子；他是真正的“心里只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他是真正做到了“四不”：不要我个人这个大富翁，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他甚至把上级历年批准给他的一亿五千万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村集体。社会上有人认为吴仁宝搞家族制。他对我说：“我这一家是为老百姓服务。不是为自家，是为大家。这样的家庭，我看多一点好。”他有四儿一女，还有女婿，个个能干，个个优秀。他多次对我说：“我吴仁宝如果搞个体，早就是亿万富翁了。我不搞个体。我要华西村的农民家家都成为大富翁。”为了别人，为了华西村民，他什么都舍得。1974年，华西有一家农民12岁的独生儿子掉河里淹死了，全家人痛不欲生。老书记说：“我有四个儿，给他一个”。毅然决定把自己11岁的小儿子送给了这家农民。这个小儿子就是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他从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得失。为了村民，为了别人，为了事业，他真正做到了忘却自我，忘却家庭，甚至忘却自己的一切。这就叫忘我奉献！

仁宝同志始终坚定信仰，坚守信念，说到做到。他一直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到他带领村民大规模创业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基层干部。他是既平凡又伟大，既普通又神奇。他说：“一个人要有信仰。我就信仰共产党。我就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几十年来，有人骂他，告他，诬陷他，打击他，嘲讽他，挖苦他；面对持续不断的曲折艰险、冤屈磨难，他都淡然处之、一笑了之，都挺过来了！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大业，为了村民的富裕幸福，他不畏难、不犹豫，不懈怠，不停滞，初心不改，坚守不移，从不左顾右盼。他始终高举共产党员的大旗，带领华西村的共产党员和村民们，昂首阔步，一路前行，终成大业。这就叫坚定信仰，坚守信念。

信仰、信念是吴仁宝精神的灵魂。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种智慧的力量。吴仁宝老书记始终坚定信仰、坚守信念，才有了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才有了超时奋进、忘我奉献。正是那样的信仰，那样的信念，那样的实践，铸就了非凡的吴仁宝精神，成就了天下第一村的华西伟业。

我特别敬重仁宝同志那一心为民的家国情怀、敢为人先的历史担当；特别敬重他那崇高的思想境界、奇特的政治智慧、圣洁的道德人品。常言道：人无完人，做人做事很难十全十美。我看不见得。吴仁宝就是完人；他所做的一切善事、好事，一切利国利民的事，就是十全十美，就是尽善尽美，就是做到了极致！

仁宝同志是用他一生的勤劳和智慧，为华西人写下了“富民大业”的精彩篇章。

人们从华西村的奇迹感悟到，一个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一旦拥有了吴仁宝老书记那种伟大的精神，能走多么远，能飞多么高，能激发出多么巨大的潜能，能战胜多么恶劣的艰难险阻，能攀登上什么样的高峰，能创造出多么丰厚的物质财富！

我经常想到仁宝同志。想到老书记，总会想到天堂。真有天堂吗？我是不相信有天堂的。我相信共产党，我相信共产主义。如果真有天堂，我看华西村就是离天堂最近的村庄。

人们在华西村看到了真正的人间天堂。老书记曾表示：“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什么叫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为了华西村民实现更高水平的富裕幸福，老书记确实是把他的整个生命贡献给了他毕生追求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在华西村看到了正在喷薄欲出的共产主义的曙光。

在全国，像华西村那样的60多万个行政村中，华西村的生产力水平是最高的，是最富有的。那里没有贫富差别，没有城乡差别，也没有工农差别，正在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华西村实行股份合作制。村民收入有三个来源：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资本分红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按需分配部分已占到村民人均收入的20%以上，还在逐年增加。

华西村民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村民是真正的主人。

华西是“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那里的干部是真正的公仆。干部和村民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亲如家人。

那里没有贫穷，没有愚昧。那是乡村里的繁华城市，城市里的美丽乡村。

那里没有恐惧，没有贪腐，没有仗势欺人，没有巧取豪夺，没有刑事犯罪。

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充满活力。那里的村民是真正的安居乐业。

那是一片净土，一片沃土；那里是圣洁的殿堂，是村民的福地，真正的人间乐土。

吴仁宝老书记带领华西村民创造了日益增长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尤其宝贵的是，他给华西村民，给全国人民，给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留下了极其厚重的精神财富。那是一座顶天立地的精神的丰碑，根植在华西村民的心中，巍然耸立在中华大地上。

吴仁宝精神犹如一盏明灯，老书记走了，灯依然亮着，把那条践行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富裕、幸福、美丽的华西之路照耀得金光灿烂、无比辉煌！

最可欣慰的是，在吴协恩书记领导下的华西村，一如既往，坚定对共产党的信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坚持老书记为华西村设定的改革路径，带领华西村的共产党员和村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踏着老书记的足迹，弘扬吴仁宝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奋发有为的业绩，依然走在新时代的最前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坚定不移地向着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我相信，纪硕鸣先生的这部大书，一定能够让更多的人，从更深的层面、更高的境界，更深刻地理解华西村这一切辉煌的背后，是吴仁宝老书记那坚定的信仰、牢固的信念，是老书记丰富的内心世界所焕发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一旦影响到更多人，辐射到更多地方，必将产生更强大的力量，带来更大范围的深刻变化。

（作者：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刘济民，2017年12月写於无锡）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新文化创新

刘年艳

农村文化是农村发展的历史积淀与时代反映，同时，服务农村的时代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二重性特征。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准确把握我国“新三农”的变化趋势，加快研究农村新文化发展态势，创新适应“新三农”发展需要的农村新文化，是我国农村长久发展面临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沿着这条主线，作者结合自己长期的调查，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理论思考，以供全国从事农村工作的党政部门及相关研究人员参考，同时，也作为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同志们参与研究。

一、“新三农”呼唤农村新文化

我们正迈向全球化、智能化、市场化时代。在我国农村,三权分置土地制度的创新,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民的生活方式;特色小镇的创建与形成,促进传统农村向现代乡村转型;农业产业化的推进,正在加快促进地方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由此不断推动传统的县域发展模式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农村发展的新态势正在成为推动我国传统农村大变革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见,一个“新三农”为特征的新型农村正在到来。

首先,新农民化。我国传统农民是社会型农民,是“小农”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与宗族为纽带的社群生活相结合形成的相对牢固而封闭的农民社会群体。我国的传统农民与我国传统农村变革相适应,新农民化将替代传统农民,呈现时代特征。随着市场化与农村改革开放,新型农村土地制度的实施,我国的农民将加快由传统的社会农民向产业农民转型。一是自由流动,离土不离乡到离土离乡;二是产权资本化加快,农民收益来源结构多元化,劳动农民向股权、租赁、转让等“业主农民”转型;三是新型农业产业工人将成为新型农民的主体。社会资本不断进入农村,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吸引与组织非农业人员向农业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农民原有的劳动技能也不断的向法人机构转移,由此,在广大农村,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纽带的新型农业产业工人正在形成。农民不再具有区域特征,更多的体现其产业功能属性。

其次,新农业化。我国农业的整体变革有三个背景,一是市场化对农业供给的新需求,要求农业产业的组织方式,供给能力及供给方式适应新市场的需求;二是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加速农业产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现代农业产业化进程加速;三是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投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农业经营主体法人化;农业资源园区化与基地化,推动优势农业产业形成,促进优质农产品的原产地化创新;适应市场多元需求的新变化,农业将发挥生态优化、文化传承、休闲养生、优质农产品生产及国民经济产业综合协调等多元化功能,区域一体,多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生态型农业、科技型农业、创意型农业、休闲养生型农业等新型农业将极大提高农业生产率与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供给水平。

第三,新农村化。传统的中国农村是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场所。农村是农民的文明成果,同时,也是“禁锢”农民自身发展的“枷锁”。这个“禁锢”主要通过两条路径的作用来实现。一是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二是以宗氏伦理规范为主体的思想约束。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广大农村形成了自我循环,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我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组织方式的变革,推动我国传统农村深刻变革,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传统农村将呈现新农村化发展态势:一是特色村庄促进农村区域多样化中心形成。以生态、文化、特色农业产业资源为基础,特色村庄将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式发展,不断聚集多样化的产业要素,形成区域特色中心,多样化的人群聚集在特色村庄正在成为未来新农村发展的新形态。二是特色小镇带动村庄发展,特色小镇将发挥农村发展的引领作用,形成“特色小镇带特色村庄”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三是乡村功能由单一的农民自组织,满足农民自身需求向满足自身需要与对外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相结合,创建综合服务体转型。四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将由家族关系治理为基础向社区现代治理方式转型。

农村文化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体,农业是农村文化的载体,农村是农村文化的展现。要研究农村新文化,就必须研究“新三农”化。只有准确把握我国“新三农”化的总态势,才能准确把握农村新文化的发展趋势。

二、农村新文化的特点

（一）农村文化的五种形态

1. 物化形态的文化。物化的文化形态是精神层面文化的物化呈现。一方面，它是人们精神世界外在化的物化表现及其外部物化对象的反映；另一方面，物化形态的文化是大众感性、体验与感悟精神文化的载体。物化的文化往往是可见的文化形态，如乡村的建筑、村庄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农民节庆与民俗活动、乡村文化设施及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字符号的表现等等。

2. 精神形态的文化。精神形态的文化往往与物化的文化形态相对应，源于物化形态，独立于物化的形态，以精神形态为表现形式。精神文化形态的文化主要以价值尺度、行为规范、榜样引领来表现，其功能往往表现为对人行为的约束，塑造人的性格等方面。在乡村，精神形态的文化往往以家族伦理规范、民风民俗、乡规民约等形式来呈现，以乡贤，长辈及家族榜样的言传身教为主要形式，影响与感化受教者。

3. 灵魂形态的文化。与人体的生理存在相对应，文化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存在形式，具有相对独立的存在方式及成长与发展路径。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文化的发育、成长、发展与变化由主导性的文化元素来支配，其本质由主导性的文化元素所决定。这个主导性的文化元素就是文化自身发展的灵魂。我们知道，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表现方式是多层面的。面对多样化的形式与多层面的文化表现，如何才能把握乡村文化发展的灵魂？文化灵魂就是文化内核，把握文化灵魂，就要把握文化内核。乡村文化的内核，有三个本质的规定性：一是超越个性化的文化表现，是一个村庄农民群体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二是超越文化发展历史阶段，是一个村庄长久的相对恒定的发展价值；三是一个乡村群体对本原自我的寻找与精神再现，是一个乡村有别于其他乡村的最本质的差别，也是乡村发展与存在的个性。把握乡村文化的灵魂，就是要从这三个维度去把握。

4. 人本形态的文化。农民的人本主义权利实现主要体现在公共权利治理表达方式的构建以及表达机制的建设两个方面。农民的公共权利的治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作为生活的主体，围绕农民个体的生活需求所派生的公共服务的权利表达与决策；二是农民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围绕经营活动的公共权利的表达与决策机制的构建；三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围绕农民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权利表达与决策机制的构建。人本主义的农民文化，其本质是体现农民的人本主义权利实现与新型生活方式的再造等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自主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新型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乡村社区治理与新主体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这种新变化趋势。这是人本主义文化创新的方向。

5. 产业形态的文化。农村产业形态的文化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产业植入形式的文化。农村文化与农业产业相融合，农村的产业融进了农村的文化元素。突显农村文化元素的产业。通过农村文化元素的植入，拓展传统产业的服务功能，提升传统产业的价值。其次，是产业传导形式的文化。农业产业本质上是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文化的传承，体现与承载着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比如，我国乡村的农耕文明就是以特定的农业产业作为载体来不断延续的。第三，是产业创制形式的文化。文化元素的可感，可体验，给人以美的享受等等，人们的“好奇心”，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为文化产业创新提供依据。在广大乡村，以乡村文化元素作为产业资源，通过相关元素的整合，按照市场化要求，创建特定产业，使文化在文化产业的创新中得以传承与创新，正在成为乡村文化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农村文化的四大功能

1. 群体共同治理。在我国，传统农村群体的社会治理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功能来实现的。这是我国乡村治理与城市社会治理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主要在于我国城乡社会发育的基础各不相同。我国农村的存在与发展

立足于两个基础：一是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以小农经济的农耕文明为生产方式的基础。二是农民的社会生活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群体为基础。所以，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的治理必须依靠文化伦理来治理农村社会。不同形态的文化相互融合，提供农村民众的文化体验，规范着乡村社会群体的行为，塑造人群的人格，推动社会群体形成共同价值与群体心理。

2. 精神文化体验。从本质上看，文化体验是大众的文化参与与文化消费。农村文化的体验就是不同人群对农村文化的参与与消费。通常，农村文化的体验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农村社群体内的农民自身；另一类是农村社群之外的社会群体。我们不禁要问，人们为什么要体验乡村文化？体验的方式是什么？达到何种体验的目的？实现何种体验价值？文化体验，是人的精神行为，是由人们精神愉悦、美感体验、自我人格塑造及好奇心需要的驱使，通过参与文化活动而形成的心灵满足。人的文化体验通过观察、感知、反思、实践与行为互动来达到体验目的。参与体验，启迪心灵，启发慧智。文化的体验功能是配置农村文化产业的基础。在农村，创新文化产业，必须以创新文化的体验功能为提前，推动文化体验功能向乡村文化产业资源转型，这是创新新型农村文化产业的条件。

3. 乡村灵魂主导。乡村文化对乡村灵魂的主导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影响人们的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伦理生活中，常常有叶落归根，传统节日回乡探亲的价值取向，思念、乡愁、团聚与心灵回归乡里等特有的精神取向是中国人的精神常态。这些文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乡村精神家园的制导效应所引起的文化主导。二是突显乡村个性。我国的村庄千差万别，乡村的个性化是乡村文化个性化的外在表现。一个村庄突出的个性就是它是灵魂。村庄的灵魂，就是一个村庄有别于另外村庄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三是塑造乡村精神家园。一个村庄特有的乡情、乡愁、乡景是人们友情、亲情、爱情等情感思念的寄托，同时，也是心灵回归，寻找真我的独有精神家园。乡村所塑造的精神家园是有别于其他文化活动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

4. 产业资源配置。人们对乡村文化的体验行为，促进了乡村文化元素产业功能的开发，从而，推进乡村文化元素进行产业资源化创新，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文化元素特征的产品，以满足大众对文化消费的需要。这是新时期乡村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乡村文化的产业资源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乡村单一的文化元素转化为产业资源形态，开发文化形态的产品，创建文化产业；二是多元文化元素与其他产业元素相互融合，创新产业资源，形成文化元素主导的文化产业；三是以其他产业元素为主体，通过植入特定的文化元素，形成以主导产业元素为主导的新型产业资源，发展新型产业。一切文化元素的资源化创新，必须以人们的“好奇心”与“真、善、美”的心灵渴求为基础，通过多元元素的融合，使元素转变成文化功能资源，这是文化的资源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

（三）农村文化的四个层面

1. 农民文化。从本质上说，农民文化就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主要包涵治理文化的构建，生活方式的塑造，文化价值的凝练三个方面。在整个乡村文化的体系中，农民文化是农村文化的核心，支配和决定着其他形式文化的发展。农民文化作为核心文化与多样的农民生产实践与生活活动相结合，形成多彩的乡村文化形态。比如，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形成农业产业形态文化，与乡村生活相结合，形成乡村文化，与城镇社区形成相结合，形成小城镇文化。

2. 农业文化。农业文化是农民文化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在农业产业中的外在表现，是农民文化的产业形态。农业文化作为产业形态的文化，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来展现。首先，文化表现。一方面，农业产业是农民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与生产成果的集中反映，是农民有形文化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农民文化元素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传承与发展。其次，产业价值。农业产业赋予其

文化的成份，实现农业产业的文化价值。农业产业可植入文化元素，实现文化元素与农业产业资源相互融合，提升农业产业价值，创新产品功能，满足文化消费。通过文化元素的资源化功能再造，培育文化产业，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第三，农村文化传承。农村文化的传承的载体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另外，农民生活的治理方式。所以，要传承农村文化，就必须依托农业生产方式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3. 农村文化。我国的农村是农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保有宗族关系的社区综合体。农村文化是农民文化的外化形式，是农民文化的农村社区文化形态。农村文化由三个主要方面来构成：一是农村社区文化治理构成的农村文化。这是农村文化的基础，其内容是宗族关系基础上的文化治理，反映的是农民的家庭伦理、日常人文及区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二是乡村风貌所表现的农村文化。由于我国乡村村庄自然环境、人文因素、民族偏好及外来文化元素的影响不同，农民的居住方式与外在环境特征各具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乡村风貌。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是农民生活方式的写照。三是“乡村性格”所寓意的农村文化。“乡村性格”所展现的是一个村庄特有的“精、气、神”。它是一个村庄农民性格与处事方式的集中反映，是自然条件、文化交流、宗族成份及村庄区位特征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的“乡村精神”。

4. 城镇文化。城镇文化是有别于乡村文化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也是我国乡村文化的一种。这种文化形态是由我国城镇发展的特殊性所引起的。从特色城镇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特色城镇的形成源于交通运输便利、区域商贸中心功能的发挥以及内外物流的贸易节点作用所形成的人、财、物的流动与区域聚集。城镇文化是特色城镇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外在反映，是本土乡村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首先，它表现为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其次，多元文化在一个区域包容共存。第三，不同文化相互借鉴融合创新，具有改良文化的特征。第四，特色鲜明。无论是建筑风格、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无不表现为鲜明的多元化的外来与本土融合发展的个性。

三、传承与创新推动农村新文化建设

（一）为什么要传承？

人类的文化遗产是由文化的自身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文化是人类发展的灵魂，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的灵魂，也是乡村社区构成的基石。文化是与人类进化相生发展的外在形式，是支配人类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文化的延续，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所以，要保有乡村的发展，就必须做好乡村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二）传承什么？

一切文化的传承都是人们依据自我的当代需求进行的有关文化元素的选择及其时代的文化创新活动。文化传承是人们自我的行为，是当代的文化需求行为，从另外角度来看，又是人们文化的历史实践行为。人们对文化元素的选择取决于人们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偏好。文化选择偏好的动因源于人们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元素效用价值的选择。人们以自我的现实需求出发，通过对文化的审判、取舍与再造来完成文化元素的当代选择。

从乡村文化的需求主体及其需求内容来看，人们对乡村文化的效用需求价值主要体现在乡村社会治理、乡村精神家园的塑造、乡村文化的体验与文化产业消费需要等方面。

那么，如何把握乡村文化传承的内容？乡村文化的传承，从传承的内容来看，需要把握三个维度：首先，把握乡村文化发展的对象维度。乡村文化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及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承应该依据农民对文化的效用价值来决定。其次，把握文化传承的发展维度。发展的维度在于超越。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超越当代个体的文化需要，将乡村文化元素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量其价值，使传

承的成果及其成效具有超越当代，跨越历史的价值地位。第三，把握乡村文化发展的价值维度。任何一种文化存在与发展对其他文化的发展都有其借鉴的价值，乡村文化对其他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与交流价值。这是由文化发展的本质所决定的。广大民众在对乡村文化体验与消费的需求价值出发来抉择文化元素时，只有以三个维度去把握乡村文化的要素，才能使乡村文化的传承成为乡村文化繁荣的动力。

（三）如何传承？

要做好乡村文化传承，应该有一个对待乡村文化发展的正确态度。文化虚无不行，文化反叛也不行。乡村文化有自身客观存在及其发展逻辑。

乡村文化是需要传承的，不能传承，不能算作真正的乡村文化。从本质上看，乡村文化传承是乡村文化的创新过程，通过创新展现时代风采。在传承中创新以及在创新中传承，是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总要求。

首先，把握传承载体。要了解传承的载体，必须了解文化的表现，也就是人们了解与体验文化的路径，如乡村风貌、民风民俗、乡村文化艺术，一个乡村人们的“精、气、神”等可被人们感知与体验的元素。这些元素的载体就是文化载体。主要有建筑风格、村庄整体的风貌、社区治理的方式标识、农业产业及文化产业等等。

其次，了解传承方式。也就是乡村文化通过什么路径来传承。乡村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社群层面，如宗族伦理、村民自治；二是个体的文化引领，如乡村榜样、乡贤引导等等。三是物化层面的，主要是通过建筑、村风村貌、产业等物化形式来展现。

第三，寻找传承动力。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是什么力量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动力在哪里？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方式，首先它是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文化是乡村农民的文化行为。对乡村文化的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是乡村农民对外在环境的适应；二是外在环境对乡村文化体验需求的选择。真正的文化创新，在于乡村外部的选择与乡村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一致性的需要。在乡村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往往存在外部强制性的文化输入，造成农民的文化排挤与文化反抗现象。好的文化，农民不接受，本质上是农民文化传承的主体错位。

做好乡村文化的传承，还要把握以下方面：

首先，尊重文化的客观性。乡村文化是乡村历史的积淀与乡村发展的时代反映。文化的客观性是文化的存在实在性。要传承好，首先必须要保有尊重的心态，承认客观存在，尊重文化现实，这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前提。

其次，要保存好。保存，是文化创新的基础。这是由乡村文化的二重性所决定的。一切文化创新都具有文化价值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它是时代化，同时，也是历史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有超越时代局限的元素。这是人们在从事文化传承的实践中，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文化现象。传承是人们时代化的文化选择，带有主观的文化选择性，所以，被选择与被抛弃在乡村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是会同时存在的。要真正做好乡村文化的传承，就要坚持在传承中保存，在保存中创新。没有保存，文化的元素就不完整。

第三，寻找精神内核。任何一个乡村，都有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的核心是乡村文化。乡村文化的发展是由乡村文化的内核所决定的。只有把握住乡村文化发展的内核，才能抓住传承的要件。乡村文化内核是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长期固化与铸造而成的核心文化元素，是一个村庄农民文化的核心价值。一切的文化形式都是从这个内核开始并演化而来，它是与其他乡村差异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

第四，文化的时代化。文化是时代的反映，同时，为时代发展服务。乡村文化的传承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时代化的创新。所以，要做好乡村文化的传承工作，必须以乡村文化时代化创新为抓手，实现反映时代，服务时代的有机结合。当代，智能、开放、创新、生态、和谐的社会价值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时代主流需求。这是乡村文化传承必须考虑的时代背景。

第五，文化的社会实践。文化活动是人的活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广大农民的文化活动。农民的文化实践是以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为基础来展开，通过广大农民的文化实践活动，内化精神文化的价值，从而形成一个村庄特有乡村文化。一切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积累与传承，必须赋予文化的实践价值，否则，都是不可持续的文化的主体再造。

第六，文化的物化。人的文化价值实现与人格塑造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传导。主要通过言传身教来实现。二是体验。主要通过大众的观察、认知、感悟与参与，使文化价值在各自的内心深化。三是实践。主要通过大众的参与行为，使文化价值在人的心灵深处得到固化，从而，塑造人的人格。所以，要做好文化传承，就必须注重文化载体的创新与建设，让文化可感，可视，可体验。

第七，文化的大众化。乡村文化是乡村农民的文化，主体是农民，动力来自于农民。要做好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确立农民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引导广大农民进行文化精神的内植。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使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乡村民众的群众运动，通过群众的文化实践，使之成为农民的人格修养、行为规范、价值尺度与乡村风尚。

（四）农村文化的创新

农村文化创新是农民新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时代呼唤。立足传统，面向未来；立足需要，贴近时代。

首先，提炼并传承文化元素。首先是提炼。通过文化评价，需求分析，将乡村文化的文化内核提炼出来。其次是传承。乡村文化的现代表现，要吸取时代精华，展现时代风貌，体现时代感，通过乡村文化时代化的创新，使传统的文化元素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光彩。

其次，开放促进文化创新。对外开放在文化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开放促进比较。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外来文化比较中取长补短。不同村庄文化、乡村文化与大众文化、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比较，推动文化形态文化功能的创新。二是开放促进吸收。乡村文化在创新过程中，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不断丰富与发展自身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形成更具时代感的文化形态。三是开放促进交流。通过开展与多元化外来文化的交流活动，不断检验乡村文化的内容，促进与提高乡村文化的内涵。

第三，乡村文化与产业融合创新，推动乡村文化创新。从文化的基本属性来看，产业是文化的成果展现，也是文化的载体，产业创新是文化创新的一种反映。农民作为文化的创新的主体，通过具体的产业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农民持久的文化创新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创新必须根植于产业创新的过程。通常，乡村文化与产业融合创新通过乡村文化元素产业化、乡村产业的文化植入以及文化元素作为产业配套，促进产业发展来实现。

第四，乡村文化在文化输出与对外传播中得到创新。文化的输出与对外传播是文化自身的功能。这是由人的社会性流动所引起的文化现象。要输出，要传播，就必须面向社会，寻找受众对象，研究对象的需求，塑造文化形式，创新传播内容，提升多元文化同台竞争的比较优势。所有的行为，必须是有目的的，有价值的创新才能实现。

四、农村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乡村文化需求新趋势

1. 需求主体。传统的乡村文化需求主体是农民。多样化传统的乡村文化为农民的精神文化消费提供服务，同时，担负农村社群公共治理的功能。随着我国传统乡村的对外开放，城乡一体化及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乡村之外的民众渴望了解我国乡村，品味、体验传统乡村文化。由此，乡村文化的需求主体，正在由村民单一主体，向开放的社会多元需求主体转型。

2. 需求内容。由于需求主体的多元化，乡村文化的需求内容也在加快变化。有体验式的文化，有产业形式产品供给式文化，有休闲养生的文化等等，乡村文化的消费内容正在由观念与社区治理形态的文化向多元的文化内容与功能转型。

3. 需求方式。传统农民主体的文化需求主要以传统的榜样传导、群体生活的需求方式为主要形式。由于乡村文化的需求主体、需求内容的新变化，乡村文化的方式也在加快变化。休闲需求、体验需求、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产业需求相结合的需求方式正在成为乡村文化的需求主流。

（二）创建五位一体的新文化

1. 培育精神价值文化。乡村精神文化价值的创建要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总揽，传承传统乡村文化与培育农村新文化相结合，适应我国新农民化、新农业化、新农村化、新城镇化发展趋势，引导农民树立“生态、科学、诚信、勤劳、开放、友爱、法律”的新观念，以新观念，推动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

2. 建设乡村风貌文化。乡村风貌是乡村文化的外在表现，也是满足大众多元化乡村文化需求的载体。乡村风貌建设要立足现有村庄风貌特色，按照生态和谐、艺术美感、文化传承的总要求，创建生态宜居家园，创新地方文化特色民宿，创意乡村风格，以此形成独具特色的村庄风貌。以优美的乡村风貌，丰富与展现乡村文化。

3. 推进乡村精神家园建设。乡村精神家园，是乡村民众精神境界的总体，是农民的精神归宿，是情感依托与自由心灵独有的心灵空间。精神家园要体现“亲情友情的人文关怀，宁静山水、草堂人家的和谐家园，文化传承的心灵启迪”。结合乡村历史呈现、创建乡村大众精神文化活动及场所、推展乡村人物与人格标榜，张扬“真、善、美”，引领塑造乡村精神家园。

4. 推进文化治理。我国农村发展的社会基础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宗族社群为主体的农耕文化。这是与城市或者其他国家农村最显著的不同点。长期以来，以伦理为基础的文化治理是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法理基础。在新时期，结合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总要求，创新农村传统的文化治理，构建民事、民治、民享的民权治理方式，推进农民人本主义文化建设，是我国乡村现代治理面临的新课题。

5. 创新产业形态的文化。创新产业形态的文化要从以下方面来展开：加强对传统农业产业及其生产方式的保存及传承，结合市场需求，推动传统产业功能向新产业资源的转型，在此基础上，培育新型产业；结合一个村庄的独特资源优势，引进与创新新型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元素为特征的文化产业，以文化产业的创新，推动文化传承；提高文化元素在传统农业产业中的地位，使新型产业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

（三）构建乡村文化发展的新机制

总体来说，乡村文化的发展要建立农民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文化产业创新支撑的发展机制。

首先，要明确农民是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创新是发展乡村文化的根基。乡村文化的发展离开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文化就没有了发育的土壤。农民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乡村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农民，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农民通过特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呈现乡村文化。

其次，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传统的乡村文化传播范围小，相对封闭，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形成的，成自然发展的状态。当代，随着我国乡村的对外开放，乡村原有的文化发展进程被打破，各种文化都在纷纷进入乡村，加快抢占农村文化市场。如何掌控乡村文化发展的主导权，构建乡村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通过主导作用的发挥，来引领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建设好乡村新文化，是目前乡村文化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乡村文化发展的主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的手里。夯实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以科学思想观念引

导乡村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引导乡村文化发展。创新文化新阵地，培育现代新农民。在总体规划设计，文化产业开发上做好管控。

第三，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发挥乡贤作用。乡贤出生与成长在乡村，对乡村怀有深感感情，有新观念、新思想，有资源，是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力量。乡贤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榜样引领与示范、先进文化的转入及文化建设的资源配置作用等方面。要引进社会力量，在引进与传播外来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创新，推进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等方面发挥生力军作用。

第四，乡村文化产业创新支撑。必须坚持夯实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对文化创新的支撑作用。乡村文化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主要通过文化创新的动力、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作用、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成果展现来支撑来实现。

五、关于乡村文化产业化

（一）坚持市场导向，创建市场导向型乡村文化产业

乡村文化的产业化要面向市场需求，创建市场导向型的乡村文化产业，这是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切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创新，必须确定服务对象，准确把握对象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做好产业资源的有效配置，运用多样化的手段进行有效的产品创新。建立面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推广服务体系。

（二）把握乡村文化产业创新路径

首先，文化元素资源化实现产业化。通过将传统乡村文化元素进行产业资源化转型，推进产业化，进行产品化创新，以优质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大众的文体需求。

其次，文化的产业植入，提升传统产业的价值。通过乡村文化元素与传统农业产业的融合，赋予传统产品的文化价值，拓展传统产品的服务功能，以此达到提升传统产品文化价值的目的。

第三，发挥乡村文化元素公共资源配置功能，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在农村，产业发展需要优质的公共资源作为配套，优良的公共资源是高端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保证。比如，一个乡村的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村风村貌及高效的管理体制等等都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的支撑。

（三）实现乡村文化产业化经营

1. 把握文化元素。文化元素是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也是产业创新的提前。从一般对象的结构分析方法来看，文化的元素主要分为文化精神、文化形式、文化表现、文化载体、文化价值、文化影响、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几方面。而从区域乡村文化的呈现来看，也可以从文化治理、村镇风貌、文化产业、生态和谐等方面来把握。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内容，再现不同的文化元素。

2. 配置文化资源。乡村文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是为了做好文化产业的创新。通常，文化资源有公共性质的资源，有产业性质的资源，也有产品性质的资源。在文化产业创新过程中，可依据不同产业发展的要求，创新与配置不同性质的资源，发挥其不同的产业价值。文化资源的配置要面向文化产业市场，选择资源配置的产业方向。一切产业资源的配置必须便于文化产品研发，有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

3. 孵化经营主体。文化产业的运营要靠企业来实现。特别是在乡村，要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就必须加快孵化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

4. 培育文化产业品牌。乡村文化产业品牌在乡村文化产业运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建立区域公共品牌、产业品牌、产品品牌相结合的品牌体系。三位一体。

5. 面向文化消费市场。消费市场主要有不同人群，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文化消费偏好。文化的市场定位，必须以市场的准确定位为前提，做好产品研发。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乡村文化发展的新机制。

6. 创新文化产品。产品的创新要实现几个结合，与需求市场相结合，与文化资源相结合，与综合性农村产业发展相结合。建立创意+传播+文化产业资源配置+产品研发+推广，引领产业开发的发展模式。

7.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化模式。产业化模式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文化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构建乡村社区、农民、企业、消费者的利益连接机制，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各方利益关键性增长。

8. 文化产业集群创新。乡村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业产业的文化化，提升文化元素在农业中的价值。二是文化元素资源化，形成新型的文化产业；三是推动各个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作者：农业部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专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浅谈国人大健康事业的研究方向

任荣荣

人之健康长寿，直至天年（顺利地平安地结束人之生命周期），这是每一个人的理想目标。

能否寿享天年？必须保障两个条件，即精神系统上的健康，和人体组织器官系统的健康。

一、精神系统健康

人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精神健康和组织器官健康，两者都有很复杂的内在联系，其联系的通道就是正能量流的不断补充。使之长期超于和谐的行动中。

但是人不是植物，是具有思想活动的高等动物，是生活在人类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受社会影响极大，受家庭、朋友、师长等种种关系人群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复杂，但归根到底只有以下三种类型，正能量流大于负能量流，正能量流约等于负能量流。正能量流小于负能量流。落实到个人，也就是如上三种状态。落实到家庭也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这是规律。

人体精神系统健康长寿的正、负能量是哪些呢？《百度》上的能量值列了一个表：

1. 开悟、正觉：700-1000
2. 安详、极乐：600
3. 宁静、喜悦：540
4. 慈爱、崇敬：500
5. 理性、谅解：400
6. 宽容、原谅：350
7. 希望、乐观：300
8. 中性、信赖：250
9. 勇气、肯定：200
10. 骄傲、轻蔑：175

11. 愤怒、仇恨：150

12. 渴爱、欲望：125

13. 恐惧、焦虑：100

14. 忧伤、懊悔：75

15. 冷漠、绝望：50

16. 罪恶、谴责：30

17. 羞愧、耻辱：20

200 振幅以上进入光的正面能量。

中医常常告诫说“气大伤身”就是不要生气，生气会伤害到身体的健康，为什么？西医证明，生气后，身体的八大器官会随之出现多种不健康状态：比如心脏血流量会增加一倍，加大了心脏供血的压力；肝脏会比平时扩大一圈，俗话印证叫气大伤肝；肺泡会不断扩张，肠胃功能发生紊乱；血液会大量涌向面部引起毛囊周围出现炎症；女性乳房出现肿块，内分泌系统发生紊乱等等。人体的能量值急速下降到 150 以下，就属于负能量了。有些人对旁人、对社会充满仇恨，愤怒，都属于“生气”一类，能量值都在 150 以下。有些人十分贪婪好色淫欲失控能量值更低约为 125。有些人道德沦落，内心充满罪恶，充满羞愧、耻辱心理者，能量值据降到 100 以下，往往达到自我崩溃程度。

而作为正能量值则是 200 以上，对人生充满希望，有信心，乐观达观，有海纳百川的宽容之胸怀，不管遇到什么天大的事都能安然处之，理性对待；平时常怀愉悦之心，宁静致远，开悟正觉，都是正能量流值！维护、保证正能量流值不下降，则必然长寿健康。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曾说“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药服，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负能量流值极低，则名医亦不能治。

中国的中医是科学，历经几千年而不衰，它讲究天人合一，善恶因果，仁义礼智信的东方文明融入其中，故而能扶本去邪。其实中医学已经超越了，并包容了科学技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著名教授曼福瑞德·波克特对中医的评价远远超过了一些国内中医学家认识。他认为“中医的确不是西方标准定义的科学，更不是仅治病的技术，说它是科学和技术，显然是贬低了它，它既是形而上之道，无形无象，通天达地；又是形而下之器，有形有象，医病救人，同时也是一种渗透东方世俗生活的文化，哲学、艺术、价值观甚至就是一种美的生活方式。”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健康而长寿的名人，隐入深山，琴棋书画、艺术、人生，参禅之学问，还有精湛之医道能遗传后世。其本质上就是当今我们向往、并努力的，反朴归真的趋势与中医悬壶济世的一种天然契合模式。

钱学森的人体健康之研究对社会有影响，钱学森思想一生贯穿了系统论思想，他说：“人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从前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前科学研究的对象总可以分解得简单一点。针对人，你就办不到，因为把人一分解，那就不是人了。所以要整体地研究它。”“我们要真正开展人体研究，就要抓住关于脑和神经系统对于人的整体作用”“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灵在什么地方？恐怕就是灵在这神经系统和大脑。

前文所述的“人的能量值”，正好印证了钱氏的论断。我们日常判断一个人的健康总喜欢用“精、气、神”三字。精、气、神三字，也正好是我国中医学研究的重点范畴。人的精气神，无疑也是证明了脑和神经系统对于人的整体作用！所以对人之健康长寿研究，首先是精神健康与否。

二、人体组织器官系统的健康基本决定于正能量流和负能量流的比例

假设，一个人的精神系统亦即脑和神经系统健康，当然可以对人体组织器官系统的健康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人体组织器官系统与脑和神经系统在量上来比，则有极大的差距，如果说脑是司令，神经系统则是上传

下达的通风联络系统。而人体组织的各种器官系统则是国防军，地方部队和公检法等组织，姑且统称为安全系统的部队，前者是量很少，而后者则是大体量。单者曾多次撰文论述，人是不能生产以营养物质组成的正能量流的，人体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必须通过人体外部输入。自身不能经行光合作用，生产碳水化物的。这些营养素物质皆有植物生产而来。血液系统不可或缺的水和氧气，必须由消化道系统和呼吸系统输入，食物残渣和人体内部产生的 CO₂ 及其他排出物质，则有排泄系统和呼吸系统排出体内。有些则通过皮肤系统输出。

人体健康长寿必须由正能量流的不断进入和补充，所以一定要有洁净的水，洁净的空气，洁净的食物，来组成正能量流。而现实的问题是，全部是正能量流进入人体是不可能的。随着环境的恶化，一些负能量流的空气、水和食物经常会进入人体影响人体健康。于是健康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的，甚至结束生命。不过世界上凡是生命有机体都是极为复杂生物，在漫长的进化岁月中，又形成了对外界负能量流的对抗性和适应性，在植物界中，就叫做植物的抗逆性，并产生了抗逆性的功能细胞群；在动物界中叫做免疫功能；并形成了免疫系统的功能性细胞群体。这是生物界中生命体的共性。生物界中无论是抗逆性功能细胞群抑或是免疫系统的功能性细胞群，都有相似的两大功能，抵御外界的负能量流清除外界负能量流物质，对内修复组织，或促使组织再生。进而，使组织器官获得康复。这种生物界的共性特点，都有一个度，其功能大小就看正能量流和负能量流输出输入的功能大小和强弱。这里应当指出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的抗逆性系统的功能性物质，还是免疫系统的功能性物质，只有植物能自己生产，而动物本身则无能力，生产自身所需的营养物质，同样都要依赖植物界去生产。在动物界有草食性动物，杂食性动物和食肉性动物，从本质上讲它们所需要的一切营营养物质，归根到底都来源于植物。中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以植物界中提供药用植物作为药源。以治本为主，进而达到表本都治的目的。西医始终是表靶式疗法，治表不治本。其结果往往还影响，甚至恶化系统性的免疫功能衰退、或破坏损害了其他组织器官的健康。从某种意义上讲，有许多西药，实际上不是正能量流，而是负能量流，此种认识，许多国人尚不明白，殊为遗憾。此种教训诸多，本文不再赘述。

所以从人体大健康层面上分析，笔者认为人要健康长寿，其研究方向应以中医学说作为基础。在植物界中寻求，健康长寿的正能量流食品方是上策，方能扩大进入人体的正能量流。只有让正能量流大于负能量流，则动物本身的免疫系统才能有效发挥它的免疫功能，这是人体研究必须遵循的系统论观点。

三、天人合一，阴阳有序饮食有节的养生系统论

动物因有植物而能繁衍生存，植物则因天道而生存繁衍，这是世界生物界的一个基本规律。绝大多数动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都和植物界的基本属性保持一致性，比如，植物从种子萌芽破土而出，有序地进行生长发育经历幼苗期，成苗期，开花结果；大部分动物和人类也同样经历着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最后完成生命的周期。植物白天吸收阳光雨露水分进行光合作用，晚上停止光合作用进入营养制造输送，和生长发育活动中，在厚积薄发中壮大自己。大多数动物，白天觅食，晚上将营养素送入各个器官中进行营养补充，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人也同样如此，和天道的运动保持高度一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阴阳有序的传统作息规律，有其科学性。中国中医学史上有“过午不食”的养身之道。综上所述，这些正是养生系统论的内容。由此再分析国人今日之现状，据报记载（包括网络文章）中国已有 8 亿亚健康人群，而中年人居多，许多亚健康人群很不注意养身之道，早上睡觉起床很迟，晚上十一二点不休息，早饭不吃或少吃，晚饭暴饮暴食，完全打破了养身之道所说的系统论规律，使整个身体的循环系统发生紊乱，从精神到人体组织器官全部趋于负能量流的搅动中，致使体内堆积了过量的“垃圾”，免疫系统的功能当然也大大降低，对于个人而言是埋下了不健康的定时炸弹，对于社会而言则会使中国古今文明的养身之道趋向崩溃边缘。

四、几条建议：

第一、国家正在努力整治环境，保证国民有洁净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洁净的食物，这是治国理政的大事。这里就当前状况，本人认为国人第一要从精神上修炼正能量流，即按前述的人的正能量流值，将其逐步提高到 200 以上。

第二、剔除体内垃圾，科学排毒解毒，减少直至消除体内垃圾毒素。

第三、大健康产业要将提高人体免疫力作为主攻方向，坚持药补不如食补的原则，坚持食用植物性健康食品，坚持适量活动，达到最终的养生的目的。从养生系统论观点上讲，社会上流行的保健品，补药类物品只能作为辅助，万万不可以作为主流养生食物。药补不如食补就是这个道理。

本人今年 76 岁了，几十年不和医院打交道，几十年身高不降，体重不降，而不聋眼不花，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正常，无病无痛。早晨五点，无论冬夏准时起床，晚上九点以后，按时上床休息，从不吃什么补药和保健品之类食品，近年又养成了“过午不食或少食的习惯”。我总结几条，保持精神上的正能量值常年在 200 以上；食物基本上是以植物健康食品为主。适时排毒泄毒，体内垃圾等毒素降低到最低，免疫系统功能常年良好。偶有感冒坚持不吃西药，不得已用点红糖姜水而已。常年以桑叶汤水当作饮料，以桑树浓缩液汁作为免疫系统的营养和排毒泄毒食品，真是得益无穷。特别已是近十几年来居住在大巴山中，呼吸的新鲜洁净的空气；饮用的是山中甘泉桑汤；吃的是自家种养的蔬菜和家畜；干着种桑养地、养畜、养人的沧海桑田事业。闲来坐看巴山云起云落，夜读群书，晨则作文学书。幸福指标始终不降也。

（作者：重庆海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 年元月）

元代的戏剧一条街

——西四砖塔胡同

张宝贵

编者按：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北京西四砖塔胡同保存的尚好，其中 56 号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新建的一座能够抗御 8 级地震的大楼，先是商业部，后是农垦部的办公地址，现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与农垦集团（公司）所用。

位于西城区西四著名的砖塔（万松老人塔）最近一次最大规模的修复已经竣工。新修后的小院内开设有“正阳书局”，人们可以在这读到很多关于老北京的书籍。

砖塔西边的胡同因砖塔而得名，叫“砖塔胡同”。这条胡同虽然不是很宽大、很长，但却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时，这里每天都有戏曲表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

胡同名七百余年未改

砖塔胡同形成于元代，而且七百多年来胡同名一直叫砖塔胡同，其名古老，这在北京是非常少见的。砖塔胡同在元代时的剧场非常多，可以说是我国戏剧的发祥地。另外胡同里还多有名人故居，比如顾太清故居、鲁迅先生故居、张恨水先生故居等。

砖塔胡同得名于这里的一座砖塔，它是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座砖塔。砖塔修建于元代，为九重八角的青砖塔，高 15.9 米。它是当时的高僧万松行秀的墓塔，所以人们都叫它“万松老人塔”。而在塔前小庙的山门上，也写着“元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姓蔡名行秀，号万松。他是河南洛阳人。15 岁时到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为僧。因其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大量的佛法知识。后云游四方，在河北磁县的大明寺向当时著名的高僧雪岩满学习。学成后，高僧万松返回净土寺升为住持，他在寺内建万松轩，所以自称“万松野老”，人们尊称为“万松老人”。

因万松老人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精通佛法，得到金章宗的赏识，他请万松老人到燕京西山的仰山（妙峰山南边）栖隐寺为住持。栖隐寺在辽金时代为京城大寺，是皇家寺院之一。金章宗于明昌四年（1193 年）在燕京召见他，并赐锦绮袈裟一件。到元代，他又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礼待，经常受到召见。万松老人告诫元世祖要“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当时的名相耶律楚材还拜万松老人为师，参学三年。

万松老人圆寂后，因其德高望重，特赐埋葬大都（北京）内西城，并建有墓塔，即现在的砖塔（当时此处尚是郊外西刘村）。砖塔胡同也因塔而得名。不过，万松老人的生时和卒年却不确切，大约生于金大定年间，圆寂于元代中叶（有的资料说他是生于 1166 年，卒于 1246 年）。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容录》、《祖灯录》、《清益后录》、《万松语录》等。砖塔在明万历年间和清乾隆年间都曾重修。尤其是在清乾隆十八年（1753 年）重修时，把原来的七层改为九层，重修时原塔未动，而是在塔外又包一层，形成塔包塔。1984 年砖塔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代每天都有戏剧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砖塔胡同还是我国戏剧的发祥地。

我国的戏剧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元代时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大戏剧家和著名剧本，大戏剧家像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他们四人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多有资料说元曲四大家为：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但郑光祖是元代后期人）。著名的剧本，像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明妃》（即“昭君出塞”）、白朴的《墙头记》（即“墙头马上”）等，七百多年来，这些剧目仍久演不衰。当时的元大都城是戏剧中心。除“元曲四大家”外，还有很多优秀的戏剧家，而且当时在大都出现了很多“书会”。这些书会既是文学组织，又是演出团体。关汉卿、白朴就是“玉京书会”的成员，马致远是“贞元书会”的成员。而戏剧的演出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砖塔胡同。

当时的砖塔胡同有很多“勾栏”、“瓦舍”，即剧场。大的“勾栏”可坐千余人，小的“瓦舍”也能容几十人或上百人。在砖塔胡同中南北两侧的小胡同里，像口袋胡同、钱串胡同、玉袋胡同等，也都有剧场。可以说，砖塔胡同在元代时是戏剧一条街。每天的砖塔胡同里，都是锣鼓喧天，高唱低吟，热闹非常。据元《青楼集》载，元代时著名的女演员如珠帘秀（朱帘秀）、顺时秀（郭顺卿）、天然秀（本姓郭）、忠都秀等就是在这里的大剧场演出。她们的艺名都带“秀”字。有时大戏剧家们，像关汉卿等也登台演出。

元人李好古写的一出杂剧《张生煮海》（即现在的评剧名剧《张羽煮海》）中有一段戏词，张羽的书童问：“你的家住在什么地方？”龙女的丫鬟说：“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遗憾的是，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里的戏班、乐户纷纷逃回家乡或解散。此后，这里逐渐成为居民区。义和团运动中，义和团在攻打西什库教堂时，指挥部就设在砖塔胡同。

张恨水在此居住近二十年

在砖塔胡同里除元代的大戏剧家们经常来往外，还有一些文化名人来此居住，如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西林春）。她是贝勒奕绘的侧福晋，在奕绘死后，被奕绘已故正室夫人的长子赶出门，顾太清携二子、二女搬到砖塔胡同居住（有的资料说是搬到辟才胡同西北处的西养马营，但多数专家考证为砖塔胡同）。后来，顾太清双目失明，但仍笔耕不辍，她的主要诗集是《东海渔歌》。她还续写了《红楼梦》，书名为《红楼梦影》，全书二十四回，顾太清是续写《红楼梦》的第一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京味作家老舍先生在任“西北城高等小学国民学校”校务主任时，经常到砖塔胡同，后来他以砖塔胡同的环境写下了长篇小说《离婚》。

当年，鲁迅先生在八道湾的住所和周作人决裂后，在1923年8月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现在为84号）。在这里先生写下了《祝福》、《在酒楼上》等名篇。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居住了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而我国近代的著名作家、小说大家张恨水先生在砖塔胡同住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1949年末直到1967年春去世。他的故居位于砖塔胡同西头路北，老门牌是43号，后改为95号。当时他住的是一座小三合院（现在大约是顺风快递公司的位置），小院里种植有丁香、榆叶梅、翠竹等花木。张恨水在这里写下了《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五子登科》等脍炙人口的小说。

1949年之前，刘少奇同志在天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每来到北平（北京）时都住在他的秘书林枫家里，林枫同志就住在砖塔胡同内四眼井胡同10号（现为南四眼井胡同2号）。刘少奇同志就是在砖塔胡同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现此院为“刘少奇革命活动纪念地”。

周总理的秘书齐燕铭同志的晚年居住在砖塔胡同37号。在1952年，在砖塔胡同中部路南82号、83号建立了商业部，到1956年改为农垦部。王震同志为农垦部部长，他的办公室就设在院内大楼里。萧克将军的也在这里办公近十年，现在这里所挂的牌子是“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

补 白

“梨园领袖”关汉卿

我国的戏剧史上，关汉卿是最为著名的戏剧家之一。《录鬼簿》中记载，关汉卿，大都人，号斋叟，曾任太医院尹。

不过，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在史书上记载的很少，竟然连他的生辰卒月都不详细。在《中国文学史》上说，他大约生于金贞祐、元光年间（1213年-1222年），逝于元大德年间（1297年-1308年）或以后。因他写过多首散曲《大德歌》，故应在元大德年间或以后过世。据《录鬼簿》中记，关汉卿和他的好友大戏剧家白朴的年龄相仿。在《元曲三百首》中介绍，关汉卿大约生活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到十四世纪初。

关于关汉卿的祖籍，在清乾隆年间修订的《祁州志》中说他是祁州伍仁村人，即现在的河北省安国市。在当地也流传这里就是关汉卿故居的说法（有的资料说他是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市）。但关汉卿在京城为太医院尹，并在大都从事戏剧活动，而且他的大半生是在大都，故人们一般认为关汉卿是大都人。元末的学者熊梦祥在《析津志》中把关汉卿列入“宦官录”，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

关汉卿和“曲仙”王和卿是挚友。王和卿为关汉卿的剧本作曲。京城红极一时的著名女演员朱帘秀出任他很多本子的主角。关汉卿是当时元剧的领军人物，人们称关汉卿为“梨园的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当时人们都以冠上关汉卿的名头为荣，比如著名的青年剧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南方的著名剧作家沈和甫，被称“蛮子汉卿”。

关汉卿一生大约写了六十多个剧本，其数量之多，可以和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相媲美。而他早于莎士比亚二三百年（莎士比亚 1564 年-1616 年）。关汉卿的剧本主要有《感天动地窦娥冤》、《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等。尤其是《窦娥冤》为关汉卿的代表作。它表现出窦娥的善良而坚强的性格，也深刻地反映了“穷人无个不冤哉”的封建社会的法制。

（作者：《北京晚报》编辑，本文转自该报 2016 年 11 月 21 日）

中国工业化的先声

——1862 年徐寿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

张蓝水

18 世纪中叶，在英国，科学家瓦特改进的蒸汽机进入实用化、商业化阶段。世界第一台成功的实用蒸汽机开启了世界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领域的重大革命性变革。蒸汽机对人类发展史的作用和地位，对之进行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蒸汽机也是世界初期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动力。

一

人们会问：中国境内使用第一台蒸汽机在何时？据 2010 年 4 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大事记》一书，其附录一：《1860-1949 中国农业机械化记事》所载，1861 年英国人在上海设立中国境内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在 18 世纪英国开始的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背景下，这个带动 100 台缫丝机的动力机器，可以断定是蒸汽机。按此，可以说这是中国境内使用的第一台蒸汽机。

二

那么，中国人制造成功的第一台蒸汽机，于何时、由何工厂或何人制作？《记事》标明“1876 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发昌机械厂制造出小火轮用的蒸汽机。这是我国最早制造出的蒸汽机。”本人作为此书的编者之一，在没有任何其他文章和资料为依据的情况下，在编辑会审中，大家接受了这一叙述。

多年来，我订阅上海报业集团编辑出版的《报刊文摘》。在 2017 年 6 月 28 日的 3 版，看到由编辑人员摘自 6 月 21 日微信号“国家人文历史”的一篇文章，编辑用的题目是《徐寿：在〈自然〉发表文章的首位中国人》。既然《报刊文摘》摘发了此文，就相信了其真实性。应对信息爆炸，我看文章有个选择，对距离自己熟悉的知识过远的文章，往往放过。但对科技方面的新东西，总要涉猎一下。对这篇文章我是抱着这种心态对待的。没有想到在这种涉猎中却发现了一个“珍宝”：中国人自己制作第一台蒸汽机的真正时间是 1862 年。

文章开头说：能够在《自然》《科学》等国际一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成就。回溯 130 年前，早已有中国人在《自然》发表了论文。作者被称为晚清科技第一人、开启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徐寿。

徐寿推崇“究察物理，推考格致”的求实精神。他曾自制指南针、炮用象限仪、结构复杂的自鸣钟，还制作出几种古代乐器。他动手验证西方近代科技书籍《博物新编》中的科学理论和实验，需要器材、工具，他自己制作。他曾把水晶磨制成三棱镜，以观察光的折射和七色光。

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洋务运动”，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算起。靠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1862年4月，曾国藩聘请徐寿到安庆内军械所，安排他“自制轮船”，这首先就要制作轮船的核心动力“蒸汽机”。徐寿饱读西方的机械书籍，对此烂熟于心。文章介绍，徐寿本身是个手艺人，对蒸汽机的所有零部件，他都凭锉刀锉出来。他的志同道合的好友华蘅芳擅长数学，在测算、绘图等方面积极配合。文章说：“3个月后，中国人自制的的第一台蒸汽机诞生。”

三

按照这个说法，就是1862年7月，徐寿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真没有想到，能在这么一篇文章中，得以知道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于1862年出自于一位科学能人徐寿之手。这与《中国农业机械化大事记》一书刊载的“1876年”上海发昌机械厂制造出我国最早蒸汽机的记录，提早了14年。这是一个对于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诞生年份的重大修正。距离“1861年”英国人开办使用蒸汽机的缫丝厂，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中国境内使用第一台蒸汽机的时候，徐寿等几个中国人就独立构思、独立绘图、独立加工，成功完成了中国人自己制作的第一台蒸汽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众所周知，蒸汽机诞生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开端，是人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技术进步。现在的所谓发达国家，无非是紧随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现在的所谓发展中（落后）国家，都因各自的种种历史原因，错过了蒸汽机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自己人制造出蒸汽机，对本国的发展有多么重要。不就是英国人在世界上首先制造成功了蒸汽机么？当时美国是有太多英国人的移民国家，19世纪初，美国也紧跟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这就是那段工业革命初期的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给这些国家插上了翅膀，欧美诸国就大踏步前进了，提前从封建社会进入了人类更高一级阶段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甩在了后面。

四

从1860年，近代中国思想家第一次提出倡导农业使用机器的言论；紧接着1861年，中国境内使用的第一台英国人制造的蒸汽机；到1862年，中国人自己独立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由此，可以看出并得出这样的重要结论：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启工业革命的时期。当时的“洋务运动”是晚清时期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是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具体行动。后来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诸多历史因素的干扰，使得此后的90多年间，我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如火如荼地进行下去。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工业革命的损失和夭折，是中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中国的近邻日本国的明治维新，起始时间为1868年，应该说比我国洋务运动开始的时间还晚些。受欧洲工业革命的激励，日本是由中央级的明治政府主导，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工业革命，掀起工业化浪潮。这场学习西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正是明治维新，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明治维新遂成为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的失败，根本原因是清王朝没有进行彻底的工业革命，国家社会经济制度落后的具体显现。“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

五

世界上除了欧洲、北美一些国家在18-19世纪紧随英国进行并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成为发达国家。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却失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时候的大好时机，以至于现在还在补课。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里？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如同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肯定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对此，笔者有如下思考：

1. 民族的进步和文明程度尚未达到足够觉醒的地步，即普遍未达到自觉阶段。
2. 仅有少数先知先觉的文化人的觉悟是不够的，必须有位居国家中央政府的决策人建立起这种自觉，进行全国性行动。
3. 一些国家闭关自守，实行封闭政策，更有一种偏执心理，藐视外来文化，乃至排斥先进文化和技术。另外，信息不灵，不知道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4. 社会不安宁甚至动荡，有的连年战争，政府和人心都无暇顾及此事，即缺乏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
5. 掌权者听不进智者建言，更有甚者，视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为洪水猛兽，怕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
6. 手工工场不够发达，又缺乏竞争；劳动力过剩，漠视科技进步；企业缺乏经济实力，难以进行技术改造。

六

徐寿（1818-1884）是清王朝末期的科学家，江苏无锡人，号雪郑(mao)。1862年，曾国藩聘其任安庆内军械所工程技术人员。当年，徐寿自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7年，曾国藩调其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徐寿设计的近代第一艘军舰“惠吉号”诞生。之后“操江号”“驭远号”等军舰相继建成。徐寿可谓是那时名副其实的“中国工匠”。

后来，曾国藩同意徐寿的建议，建立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由徐寿任总管。17年间，徐寿共译著书籍137部，约290万字。其中以化学译著最为出名，被称为近代化学的先驱。翻译的《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书，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70-80年代化学知识的主要内容。徐寿更是首创了化学元素汉译名的原则。他选用罗马音的首音（或次音），找到同音字，加上偏旁，用于化学元素的译名。中学要熟背的汉字元素周期表，大部分出自徐寿的翻译。这种社会贡献是永存的。

为了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徐寿与傅兰雅等人于1875年在上海创建“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上海格致书院开设有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多门课程。徐寿与傅兰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汇编》。除了在该刊发表科技论文外，徐寿还向外国科技期刊投稿。1881年的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就刊有徐寿的论文。文章对传统声学定律“空气柱的振动模式”（即伯努利定律）提出质疑，并用当代的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

七

正如《报刊文摘》摘发这篇文章的题目所示：“徐寿：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发表文章的首位中国人”。但是，如果我来摘发这篇文章，有可能会用这样的题目：“徐寿：成功自制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的中国人”。我的看法是，能在1862年就自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引发或助力中国工业革命，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贡献，在中国经济、军事发展方面的作用，对中国大众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力，要比在小众范围的哪怕是国际顶级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在中国历史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要巨大、重大得多。当然了，如果采用“徐寿：成功自制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的中国人”这样的题目，也就免去了广大读者包括我这样的人，与之失之交臂的可能。因为除非专门的科学家，一般人可能也不会读“徐寿：在《自然》发表文章的首位中国人”那样题目的文章。而一般科学家或科研机构也不见得订阅这份新闻和知识普及型的《报刊文摘》，他们也就看不到这份报纸，便无从看到这篇介绍中国人徐寿1881年在这份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故事了。从造蒸汽机和刊发论文这两项相比，徐寿1862年的贡献要比1881年早得多、历史价值更重大得多。

八

徐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翻译家，更是一位实干家。他有坚定的信念、深邃的理论、丰厚的外语储备和勇敢的实践本领。特别是实践本领是现代一些智者缺乏的气质。我国经过大学培育出了校门的人，往

往要在社会实践中摸爬滚打多少年，才能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能力的人才。试想徐寿在那样贫乏的条件下，他居然能够完全用两只手把蒸汽机做出来，是多么不可想象啊！

如今，我们认识了清王朝晚期的徐寿，是他为中国成功制作了第一台蒸汽机，造了第一艘军舰，建了第一所科学技术学校，首译确定了汉字元素周期表，成为首次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发表论文的中国人，一生翻译了那么多外国科技书籍。从徐寿的这种种功绩可以断定，徐寿不愧是近代中国一位科学和技术全才性的伟大人物。可是，社会让人们将曾国藩烂熟于心，却长期不知道徐寿其人，这很不公正。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灿烂的年代。方兴未艾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千千万万个徐寿样的人物。时代呼唤徐寿式的新一代科学家和艺术家，为建设和颂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振兴乡村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贺雪峰

2017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部署。可以想见，接下来各地方的“三农”工作必然依照这一战略进行调整和安排。而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战略与策略、长期目标与近期规划如何衔接，就成为必须讨论的问题。

从会议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来看，中央计划分三步走，经过六个五年计划，也就是用30多年时间完成乡村振兴。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能机械教条，不能形而上学，也不可能现在就明晰所有具体方案与步骤，而是需要在实践中边摸索边前进，甚至还要经历若干次反复才能最终达到目标。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现阶段也正是中国史无前例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意味着农村人财物资源向城市的聚集。这种资源流向，使农村变萧条具有了某种必然性。这与城市本身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有关。在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只有8.5%的情况下，农民的富裕必然以减少农民为前提，农民大量进城是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的基本方向。

农民进城首先表现为农村富裕家庭和具有在城市就业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留守农村的则是缺少进城机会的老弱病残群体以及进城失败返乡的群体。这部分农民在村庄中与土地结合起来，可以获得远比在城市漂泊更好的基本保障。也正因这个农民群体可与土地结合，可在村庄熟人社会生活，中国才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才保持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除了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农村发展本身也存在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与中西部农村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农村早在上世纪就完成了工业化，区域经济融入了沿海城市经济带，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是说，其建制虽是农村，但经济活动已城市化，农村土地也主要用于二三产业建设而非农业生产。

相反,在当前占农村地区主要比例的中西部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民主要依靠传统农业收入,这样的农村已丧失工业化的条件。繁荣的东部沿海农村与日渐萧条、空心化的中西部农村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拥有资源的农村和缺少资源的农村。工业向城市和园区聚集已成大趋势,而仅靠农业又不可能支撑数亿农民的富裕。于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成为农村地区的一个选择,现阶段,这种探索主要集中到了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上。

问题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都将保持四亿到五亿的农民,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充其量只能“养活”几千万农民,而且这些能够受惠受益的农民,一定来自具有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的特定少数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在全国农村中的比例不超过5%。这些农村不用政策照顾或财政支持,具有高度市场敏感性的资本自会进入,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推动相关业态发展。

那么,占中国农村90%以上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如何振兴?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美丽乡村”能否得到“美丽经济”支持?国家支持又能否得到乡村社会内部的响应?这些都需深入讨论。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地区不可能也不应当从先发地区学习乡村振兴经验,甚至从策略上讲,作为一项长期历史任务的乡村振兴,恰恰是以一个时期内部分乡村人财物资源向城市聚集为前提,比如如果没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在当前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条件下,乡村全面振兴很难实现。鉴于农民进城是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乡村振兴战略也就不能急于求成。

正因面临以上这些现实,地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尤其要注意防止线性思维,要懂得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长期历史任务”所要经历的复杂过程。

(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来源爱思想网2018年1月15日)

中国的“精准扶贫”及其未来

郑永年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高层的重要政策议程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成就一直是中国的骄傲。在短短数十年里,中国已经使得近7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为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不过,新的反贫困运动仍然必须,因为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收入分化和社会不公平,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不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政府保护社会的最基本手段。也就是说,扶贫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任何社会都需要寻找有效的手段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手段。

就中国来说,扶贫这个“抓手”极其重要,也经常被视为是中国制度的强项。尽管这么多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每一个新阶段,当出现新贫困情况的时候,就要寻找新的方法。

不过,任何一种特定的扶贫方法,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问题,需要随时加以纠正。近年来的精准扶贫方法也不例外。

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精准扶贫能否实现原来所设想的基本社会正义呢?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这些问题甚为严重,如果不纠正,不仅难以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反而会恶化形势。

精准扶贫过程出现的问题

在“精准扶贫”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贫困”的鉴定。有几个因素表明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第一，信息问题，如何收集、鉴定、处理信息。在农村并不存在精确的信息，例如有关资产（房屋）、牲口、土地、家庭成员、健康、教育等等方面的信息即使存在，但鉴定者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第二，基层政府和社会往往脱节，没有足够的能力掌握精确的信息。因为精准扶贫是自上而下，官员最终需要依靠地方“强人”来掌握、鉴定和处理信息。这种情况就非常有利于地方强人。近来，有关部门也引入外来人员对实际贫困进行调查。不过，这里出现的问题更多。

一方面，因为并不存在对这么大规模的扶贫进行科学调查的人才，实际上往往派毫无实际经验的大学生入村调查。另一方面，因为问卷调查的设计者完全脱离中国农村的现实（尤其是农民的理解水平），导致农民无法回答表中的问题，从而变成调查者自行填表。因此，有人戏称，精准扶贫已经演变成为了“精准填表”。

第三，正因为农村存在“强人”（甚至“村霸”）因素，扶贫往往演变成扶“富”，即扶贫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地方“强人”（干部、干部家庭成员或者亲戚朋友、村霸等）。在基层，“黑白两道”经常竞争分配来自上面的利益，甚至导致冲突。“扶贫”演变成“扶富”的另一个因素，是对脱离贫困时间上的限制。

扶贫追求效率，就是要促成贫困者尽快脱贫。在执行过程中，扶贫者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但很难脱离贫困的家庭或者个人并不感兴趣，而只对那些很快就可以脱离贫困、甚至并不是那么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感兴趣。

第四，扶贫繁琐的手续。在一般情况下，在中国社会，贫困并非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鉴定贫困则有做不完的手续。因为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即使是贫困户对此也不那么感兴趣。在基层，老百姓普遍相信，真正大的利益不会通过这种正常方式来分配。

所有这些因素无疑会影响社会公平的实现。此外，精准扶贫也产生着新的问题。因为精准扶贫基本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就存在着一个分配给谁的问题。因为是通过分配方式进行，经常会导致村民“阶级”的再分化，产生新一类型的社会“不公平”，表现在不同宗族之间、家族之间、村民群体之间。

一旦涉及利益分配，这些传统的因素和新产生的因素都会卷入进来。这样很容易产生新的“认同”政治。在很多地方，社会对基层官员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精准扶贫”是一种新的政治，搞不好造成新的隔离和新的对立。

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会造成新的民族对立。新疆、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密集的地方，精准扶贫很难逃避民族矛盾。实际上，对民族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难理解，这些干部必须面临“照顾哪一个民族？”的问题。即使民族干部在分配扶贫资源上不偏不倚，做到尽量公正，但不同民族成员总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民族成员会问，为什么这个民族得到多而我们这个民族得到少？他们总是相信民族干部把大量的好处分给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而自己受到“歧视”。实际上，这种看法在基层很普遍。因为干群关系的紧张和互不信任，很多人都会认为，只要和“上面”（指政府和政府官员）有关系，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就没有。

也必须注意到的是，精准扶贫很难覆盖到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即农民工。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比较有共识的估计是有2亿7000万。这个群体也很难说都是贫困人口，实际上他们因为外出务工，经济情况比留在农村的人口会好一些，因为有能力的人才出去打工。不过，也不能否认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沦落为城市新贫困人口。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在农村推行的精准扶贫不会考虑到他们；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推行的精准扶贫也不会考虑到他们。

今天，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在城市里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出生、长大和生活，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没有任何回到农村的意愿；即使回去了也做不了农活。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长期生活在城市，而没有城市户口。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群体甚至较之农村的贫困人口和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人口更为重要。一旦他们沦落为城市贫困人口，他们便有了很强的政治意义。

此外，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也需要改进。因为是国家动员型的反贫困运动，可持续性往往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考量。第一、基层干部考核问题。基层干部是实施精准扶贫的主力，为了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在很多地方，脱贫成为考核干部的最重要的指标。经常的情况是，在贫困现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干部就不能被提拔，不能换岗。这导致了至少两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首先，这种巨大的压力为干部造假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机制。一些干部抱着“赶紧脱贫和赶紧走人”的态度，在扶贫方面造假。尽管现在也在实行扶贫的责任制，干部在提拔时上级部门可以回溯到他们以前的成绩，不过很多干部只看眼前的利益，而不会考虑长远的利益。其次，与之相关的是，干部往往采用“用尽现有所有资源”的办法来体现自己的政绩。因为要尽快脱贫，干部往往千方百计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而这种动员是否可持续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这样，他们往往把“债务”和问题留给后来者。

第二，干部任期过短，也造成短期行为，不利于扶贫的可持续性。近年来，干部加速轮换，往往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被调离。一些干部赴任的时候，带去很多项目（往往通过政商关系，例如带去一些商人搞当地建设），但都还没有做完就被调离。这种因为频繁人事变动所造成的浪费和腐败是惊人的。

如果让他们在一个地方继续下去，他们的确也有做好的可能。因为是短期，一些干部就变得好大喜功，不讲市场规律，一会儿叫农民种植这种经济作物，一会儿叫农民种植那种经济作物，造成了农民和国家双方的损失。因为不讲市场规律，所生产产品往往卖不出去。由干部推动的农业生产项目全国到处开花，但并没有很多比较成功的例子，更多的例子是失败的。

扶贫的可持续性

对任何国家来说，扶贫都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因此扶贫的可持续性非常关键。在基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担心，这样大规模的扶贫，尽管可以出现正面的短期效应，但在资源耗尽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源来继续扶贫，返贫情况会变得很严重。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各国扶贫历史上都发生过。也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扶贫引发的基层政治有可能导致基层政权的进一步弱化。

可以预见，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拍苍蝇”运动即基层反腐败运动的推展，基层扶贫干部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基层反腐败也是通过基层干部之间互相揭发和告发，或者号召民众来揭发和告发，基层干部之间的互相怨恨和民众对基层干部的怨恨，也必然会利用这次机会爆发出来。如果这样，一场“四清”式社会运动也是会爆发出来的。

精准扶贫需要很多条件，如果可以顺利实施，也会是一个扶贫历史上的奇迹。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扶贫”以选区为单位，选区议员的一项任务是找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穷人）。新加坡没有实行西方那样的具有普世性的福利制度，因为从西方的经验看，普世性的福利制度往往导致滥用。但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后是有很多条件的，其中几个条件非常重要。

第一，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到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新加坡，80%多的公民居住在政府组屋。第二，健全的财务制度，政府知晓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第三，透明的制度，在每一个选区内大家都互相了解。第四，不腐败的官员队伍。

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其城市国家的性质所致。相比之下，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制度尽管在发展，但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不过，随着技术条件的改进，中国也可以完善这些制度，只是需要很长时间。

实际上，中国也需要在总结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经验基础之上，考虑其他更符合国情和社情的方法。扶贫需要考量到很多的大发展趋势，包括政府责任、社会流动、基本人权的实现等等。简单地说，政府有责任促成所有其管辖下的居民（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固定人口）基本公民权的实现。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可能需要实行更具普惠性质的社会政策。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会政策的统筹

级别。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统筹只是市一级，连省一级统筹都还没有实现，更不用说国家一级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只有“市民”，而没有“公民”。发达国家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基本社会政策都是国家统筹的。中国的国家统筹不是不能实现，而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低级别的地方化统筹不可避免。

但经过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足够条件来提高统筹的级别。这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达成，逐步地从市一级提升到省一级，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统筹。统筹制度建设对扶贫所带来的效果，会远远超越 80 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各种扶贫方法。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转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

二十四节气的演变

梁庆鹏

编者按：我国的先人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对气候的变化和日照影长等有所观察。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对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进行了划定。到了春秋末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也已经确立。至西汉时，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确立。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所谓“农者天下之大本”。但受早期生产力的限制，我国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靠天吃饭”。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能准确判断天时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就迫使我国的先人很早就开始观察研究天气的变化规律。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实践，我国的先人逐渐总结出了天气变化的规律，并制定出二十四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那么，二十四节气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

“四时”的出现

节气中最早出现的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也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和感官体验。最早有关春夏秋冬四时之分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尚书·尧典》中，其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鹖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里面所说的“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就分别相当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日”可以解释为“白天”，“宵”可以解释为“夜晚”，“中”可以解释为“平分”。“日中”和“宵中”的意思就是昼夜相等的两天，也就是春分和秋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是白天最长和最短的两天，也就是夏至和

冬至。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还发现，当时我国不仅有了“四时之分”，还已经把冷暖交替的一年轮回定为 366 天，并通过闰月的形式进行调节。

此文出自《尧典》，记录的是尧舜时期的事情，但考虑到《尚书》是西周时期所创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多次修改，要说在尧舜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四时之分”还有些牵强，需要考证。但如此精准的测量，说明在西周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开始对天气的变化有了长期系统的观察。有学者还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其中的阜、甲、中等字有“立表测影”的意思，这说明在商朝人们就已经开始观察太阳的照射对物体影子的影响了。同时，源于夏代的《夏小正》中也记载了有关星象、物候等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在夏商时期就应该具备了很高的天文观测技术，只是由于文字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断定此时人们已经提出了春夏秋冬四时的说法。但到西周，已有了“四时之分”是确信无疑的。

“八节”的出现

在春秋末年的《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两段：“玄鸟氏，司分者也。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氏，司至者也。伯叔，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氏，司启者也。青鸟，鸛也。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氏，司闭者也。丹鸟，鷩也，以立秋来，立冬去。”“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从第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几个节气的表述。而第二段文字中的“分、至、启、闭”，根据西晋杜预的注解，则分别代表着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这说明到了春秋末年，二十四节气中重要的“八节”就已经出现了。至此，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框架已经构成。而这“八节”的变化也基本反映了一年内自然界季节的变化过程。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

二十四节气比较完整的出现是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吕氏春秋·十二纪》中除了出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外，还分别在《一月纪》中提到“蛰虫始振”，《二月纪》中提到“白露降”，《九月纪》中提到“霜始降”等。这说明二十四节气在完成了对季节变化的划定后，又开始向着降水降温和农作物生长等物候方面生进行了发展。

与现代二十四节气名称完全一致的内容出现在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其中记载“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则惊蛰，……加十五日指辰，则清明，……加十五日指巳，则立夏，……加十五日指午，则芒种，……加十五日指未，则小暑，……加十五日指申，则立秋，……加十五日指酉，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戌，则寒露，……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子”。其中出现的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已经和现在完全一致。在西汉的《周髀算经》中还对每个节气的日影长度做了计算。

另外，在东汉时期的《汉书》中还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推演方法：“推冬至，以策余乘人统岁数，盈弦法得一，名曰大余，不盈者名曰小余。除数如法，则求冬至日也。求八节，加大余四十五，小余千一十。就

二十四气，三其小余，加大余十五，小余千一十。”

综上所述，到西汉时期，二十四节气已经发展成熟。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二十四节气并不是一起出现的。它是伴随着我们古人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而逐渐丰富的。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提出的是人们感受最为直接的春夏秋冬四时。随后到了春秋时期出现“八节”，进一步将一年中四季的变化表现得更加细致。到战国时期，许多有关降水降温的因素开始被加入到二十四节气中，使二十四节气进一步得到丰富。至西汉时期，二十四节气已经逐渐演变成熟。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

农发推进种业科技创新

福建省农业厅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和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十二五”期间，福建省农科院、三明市农科院、福建科荟种业有限公司等7家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先后得到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的支持，共投入项目资金155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740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440万元，集中用于原原种繁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良种推广步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种业基地不断扩展。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的实施，使福建原原种基地沟渠及机耕路配套完善，灌排更加便利，抵御灾害能力增强。以福建禾丰种业有限公司、福建旺穗种业有限公司为例，原原种项目完成后，由于生产条件得到有效改善，促进了杂交三系、两系稻制种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当地及周边泰宁县、长汀县、邵武市、宁化县制种面积发展到万亩以上。据统计，全省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由2012年的15万亩，扩大到2016年的25万亩，福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之一，仅建宁县年生产杂交水稻种子就达到2500万公斤以上，约占全国杂交水稻种子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实现产值4亿元。

——增强科研开发能力，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资金支持下，福建科荟种业有限公司科技人员开发出一个突破性水稻恢复系——“闽恢3301”，2015年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利用“闽恢3301”选配的杂交水稻组合达到30多个，目前全省推广“闽恢3301”系列杂交组合达2000万亩，创造经济效益20亿元。同时，该公司经营规模和销售收入跃居福建省种业行业前列，2016年实现销售收入1.25亿元，利润1886万元，其中出口杂交水稻种子1232.76吨，创汇3122.68万元。

福建禾丰种业公司在农发项目帮助下，按照国家种业发展“育繁推一体化”的思路，以禾丰种业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和福建省农科院水稻所、福建农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科研机构为技术依托，不断加强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加大自有品种的选育和合作开发力度，促进公司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目前，公司已拥有科研育种基地300亩，收集育种材料2000多份，制种组合近百个，通过自育、独家买断经营权、合作开发杂交水稻新品种达21个，正在参加全国各级区试（筛选）的后续新品种10多个，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添置更新仪器设备，育种加工能力提升。承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的种业公司充分利用项目资金，引进种子精选加工生产线，添置种子检验仪器设备，修建种子常温库和恒温恒湿库，使育种与加工检测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如禾丰种业公司新上种子质量检测设备 23 台，制冷设备 2 台，加工设备 6 台，使种子收购期间能够得到及时净选、加工与检测，确保了种子质量达到国标要求，并适时组织入库和外调。该公司还建立了较为先进的生物检测实验室，可开展 PCR 检测商品种子纯度 2 万多份，为公司生产的种子出口越南、印尼、巴基斯坦等国，提供了快速便捷的纯度检测手段。

——开展多项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制种水平。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支持下，各项目单位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如禾丰种业围绕杂交水稻种子亲本原原种及原原种繁育技术、杂交水稻制种丰产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推广，共组织技术培训 8 期，培训 1140 人次，有效提高了项目区农户的科技素质和水平。科荟种业创建的 150 亩“谷优 3301”高产制种示范田，取得了亩制种 250 公斤的佳绩。承担项目的各种子企业还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活动，如研究春制、夏制和烟后制不同组合的技术特点，尤其是父母本花期的精准控制，以及除人工授粉外的全程机械化操作等，在提高种子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实现了节本增效。

——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增加制种农户收入。禾丰种业借助建宁县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与当地 6000 多农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安排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 3 万多亩，年生产加工杂交水稻种子 600 多万公斤，先后为中种集团，湖南隆平、安徽荃银等种子企业提供大量优质杂交水稻种子，产品还销往南方 12 个省市，并出口到东南亚等水稻生产国。农户通过与公司合作，接受公司的技术培训，不断掌握制种技术要点，大多成为专业制种能手，不仅能承担科研单位新组合试种工作，而且人均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有的农户可承担 20 亩制种任务，制种收益远高于非项目区农户。据统计，杂交水稻制种项目农户每户每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是种植水稻收益的 3—5 倍，从而加快了增收脱贫的步伐。

（本文由福建省农业厅提供，刊登在《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17 年 12 期）

在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座谈会暨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上的讲话

胡兆荣

今天，我们与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学习研讨十九大提出的三农工作的新任务、新目标、新思路和举行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召开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年会，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在此我谨代表全所干部及职员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地感谢！

2017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几天前又刚刚闭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

这一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进入攻坚阶段。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

这一年，是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线，农业结构将以市场为导向持续优化调整，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有望继续增加，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矛盾将得以缓解。粮食产能保持稳定、结构不断优化，绿色生产方式不断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促进。

这一年，我所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农业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林科学院等部委和科研院所的指导和帮助下，在社会各界同仁的鼎力支持下，通过本所全体职员的团结努力和无私奉献，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阶段性的成果。

回顾这一年走过的历程，我们在充满喜悦与艰辛的道路上，收获着拼搏的豪情和胜利的果实。现将今年的工作情况向大家汇报如下：

一、工作完成情况

1. 按期完成了《通讯》的编排、出品和寄送工作。全年共计编排通讯 15 期（其中增刊和专刊共 3 期），发表文章 160 余篇，文章篇幅 60 万字。

2. 完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综合论述文集》和《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文选》的收集整理印刷。其中《中国农村改革综合论述文集》共 16 篇，13 余万字，《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文选》共收集整理文章 110 篇，近 60 万字。

3. 完成了研究所官网和《农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的正常运行工作。在宣传形式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传播方式上赢得了高度赞扬，资讯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为“三农”最新资讯权威发布和农业创新科技的推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4. 扩大了基层三农调研员的征召工作。为了促进对基层三农工作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及时了解基层三农工作的动态，切实掌握基层三农工作的真实情况，准确获取基层三农发展过程中的信息，着实办好本所的《通讯》内刊和发布相关公众信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产、学、研、销一体化相结合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活动，我们报经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征召了近二百名基层三农调研员，基本达到了全国省级城市全覆盖，确保了基层三农信息的及时获取和农业创新科技的有力推广。

5. 菌草产业的创新合作以及基地的创建。本年度中期，我所与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明确了推广方案和职能目标，并在陕西安康建立了本所自己的试验基地，修筑了田间道路，搭建了越冬暖棚，建立了养殖试验点。这对于相关数据采集、环境适应、产量确认、清储饲料制作、菌草酿酒和其它用途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6. 农业科技讲习所首讲开课。“农业科技讲习所”于 12 月 29 日在四川广安市市委党校首讲开课，讲习所与本研究所实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讲习的授课人员均来自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水利部等部委及部属各科研院所，不论是授课内容还是 PPT 课件，都高度重视，做了精心准备，虽然时间很短，但培训的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教学认真、氛围浓厚、组织严密、领导重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为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初衷，也是我们讲习双方对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一次践行，应当地政府的需求，在该地设立了西南讲习基地。

7. 支持帮扶企业不断迈进新台阶。2017 年，我们深入涉农企业 30 余家，调研指导帮扶，协调争取补贴 8600 万元，协调流转土地 56000 亩，其中工业用地 3000 亩，促成上市企业 21 家，其中企业主板上市 3 家。帮助指导企业获得国家标准化育苗基地 3 家，晋升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 家。

8. 与北京市政府下辖机构达成了地下空间的合理化利用。上年度末，本所主要领导与北京市政府下辖机构，调研了二十余处地下空间，涉及地下空间达两万余平方米，因其所占地域的特殊性，既不能供人食宿，又不能储藏大量物品，经过双方达成共识，决定利用五至十年时间，将中心城区的四千多处地下空间合理化用作植物工厂和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有效的提高了闲置空间的利用率，保证了市民生活食材的安全性，解决了城市购菜难的最后一公里，全部建成后可为十余万人提供安全放心的绿色无公害蔬菜和食用菌。

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2018 年一定是硕果累累，丰收在望的一年，这一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又是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周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奋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关键的一年。所以在这一年里，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更不能掉队，牢记“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的伟大真理，在巩固成果、打牢基础的同时，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1. 认真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深刻认识新时代新矛盾新战略，科学把握“三农”工作的新起点新目标新任务。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三农”提出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的重点任务。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农业农村经济工作重点，科学谋划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2. 做好上年度各项工作的延续的和深化，做实历年来各项成果的巩固和众多资源的利用，强化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全面提升队伍建设水平。牢牢构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基层三农调研员的管理工作，加大农业经济技术与研究的示范基地建设，扩大农业创新科技的传播力度，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利用率，加快拓展设施农业和特色农业以及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规划咨询工作，为服务“三农”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

今天我们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同时，又能对农业农村发展和制度变迁历程进行回顾，还能总结我国农村改革 40 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能够对有关农业农村政策出台的背景、重大政策理论突破和尚待解决的问题等进行研讨，这必定是一个重要和必要并存的研讨会，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多指发展方向。

本次会议，得到了在座各位领导和各位来宾以及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厚爱，我再次代表本所的老领导和全体职员，对大家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做好“三农”各项工作，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奋力推进“三农”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为早日实现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的“三农梦”而拼搏奋斗！

（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2018 年 1 月 6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各省农委（农业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5015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部门协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推广培训处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责 任 人：黄维东

